



新华h a i

新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

X

i

u

Z

NO.4

目 录

第 四 辑

录
海
漫
游

二 战 争 与 和 平

- 李向平 谁是下一世纪的预想敌 ····· 2
- 耿 敬 心性和平观在创建人类和平中的意义 ····· 9
- 倪乐雄 儒家战争观与国际安全体系 ····· 15
- 郭长刚 西方文化的攻击性 ····· 21
- 王 蔚 和平共处——从策略到准则 ····· 27

- 王宇信 新世纪甲骨学研究的展望 ····· 35
- 江晓原 孔子诞辰：公元前 552 年 10 月 9 日 ····· 40

- 萧功秦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 43
- 周 宪 新文化人乎？新中产阶级乎？——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追问 ····· 50
- 潘知常 高雅的赝品：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 60

- 吴冠军 数字复活了 ·····

- 李振声 跨文体写作：“对文学整体说话” ·····

张新颖 化身为摩登女性的现代性	· 78
■ 关键词	
谢遐龄 唯心主义	· 84
■ 文谭	
陈桥驿 我说胡适	· 88
余斌 桨声灯影	· 96
■ 谈艺	
杭间 关于“学院化状态”	· 101
吴凡 一道无法穿越的大门——JIM 的音乐、肉身与灵魂	· 108
■ 阅读	
朱易安 品位之中的品味	· 114
■ 信笔	
黄荭 历史的断章——欧洲吃文化一瞥	· 120
李伟国 缘起	· 124
王蒙、谢春彦 深圳一首	· 封二
崔彦伟 作品 No.5	· 封三

《辞海新知》编辑部

主 编 李伟国

编 辑 吴雅仙 赵荔红

乔 升 冯 涛

《辞海新知》第四辑

责任编辑 冯 涛

版面设计 杨钟玮 明 婕

封面设计 姜 明

出 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 021 - 62472088

传 真 021 - 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26-0648-1/N·10

定 价 6.80 元

编者按

冷战结束之后，科索沃冲突无疑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由科索沃战争引起的反思，也可以说是近几个月来东西方知识界热烈争论的话题，它将涉及人类对于21世纪时代主题的认识。

曾有论点怀疑，和平与发展是否还能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与此相应的是，有些媒体围绕着“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战争离我们有多远”等频频关注战争问题。

于是，我们与正在筹备建设当中的上海大学和平学研究所诸位同仁，组织了这一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专栏文章。原拟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标题，但鉴于时下一般媒体对“战争”的关注，故而针对性地采用了“战争与和平”。由于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密切关系，由于和平不仅仅是战争、冲突的消极性防止与斥除，它作为一种文明信息、一种价值诉求、一种国际关系平等相处和反应的民主机制，亦关系到不同文明体系、不同价值标准、不同民族利益乃至不同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相互尊重和彼此尊重，更涉及到当今人们最为关注的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及和平安全法则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这组文章并不完全着重于对于战争问题的论述，而是把思维的触角延伸至有关战争、和平、发展的各个层面，旨在引发对于时代主题或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战争与和平

谁是

下一世纪的预想敌

..... 李向平

(一)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并不平静。

战争，这个令人心惊的字眼，又重新浮现在后冷战思维的层面，表现着这个时代的骚动不安、科索沃战火、印、巴克什米尔冲突、朝、韩黄海交战，俄罗斯进军车臣……

冷战时代的敌我非已经有所变异，却又作为“冰山原理”依旧作用于当代文明世界。曾经风靡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后冷战思维的策略性表现话语，这种叙事语言，乃是将自己安排世界秩序的权力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并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主宰者身份、随意处理不同民族、地区的文明体系如何并存相处等全球性难题。正因为如此，善良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主题是否还是和平与发展？

没有对手的世界似乎过于寂寞了，因为英雄已无用武之地。



由于冷战思维的持续性强势作用，促使这个表面上看来已不复存在敌对势力的世界，依旧有一股想方设法寻找敌对力量的执著。于是，世界并不冷寂，已经呈现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始终难以构筑在后冷战思维的沙滩之上。

近期，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政策高级顾问乔拉森·波拉克博士来访。双方就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座谈。主要从1999年9月10日兰德公司分析家敦促美国政府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接触政策”谈起。



《呐喊》 萧克

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们对于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深感忧虑。认为在未来的15至20年内，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多方面的地区强国，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接触只会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威胁更大的对手，或者说，接触并不能使美国明了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以遏制性的接触政策，才能够做到既维持合作关系，又能抵御将来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和目标所形成的挑战。

对于这一建议，乔拉森·波拉克博士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兰德公司，也未必是明智的考虑。他说，“这时提出遏制政策，已经太晚了”。但是，波拉克博士在座谈中也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惟有中国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视而不见；而且也只有发展中的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美国人对于目前中国的发展不无忧虑。他

还对讨论中的驳难提出一种假设，认为中国如果与美国同为一种类型的民主国家，也许美国人就不会为中国的发展而深感不安了。

很明显，此乃“民主和平论”与“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版本。它把战争冲突、国家利益之争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观任性地以其他字眼掩饰过去。这对于后冷战时代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可以说是极不负责任的。

发展中的中国怎样被固有的世界秩序公正、和平地接纳，这将在很重要的层面上决定着冷战之后世界格局能否很好地建立。面临着固有的世界体系，新崛起的国家如欲加入，必然会提出新的要求，重新制定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或改变已有的不符合它们利益的那些原则。这时，既有的强国或强势集团便会感到难以坐视和容忍已有秩序的分化和重组，不愿新的势力与之分享世界领导权。这正如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和民主都不是主张团结的意识形态，它们是过程意识形态，强调谁服从被推荐的程度，谁就会比不服从的人得到更多的经济上的好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记得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时，人们曾满怀希望欧洲乃至全球各地区可以迎来和谐与秩序的时代，甚至民主扩张论的主张者、拥护者都认为随着新的国际体系的构成和西方民主生活方式在全世界的确立，战争和冲突将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是历史的经验常常证明：民主往往并不能防止战争的爆发。

有统计资料可以说明，战争冲突爆发的次数和范围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紧密联系。虽然我们不可简单乐观地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促使战争冲突的数量与规模趋向减少减弱，但在某

有学者作过如下统计：从1945年至1985年，世界上发生过107次武装冲突，其中15次发生在第三世界，在这段期间里，只有28天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传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已在减少，因为内冲突与战争则在增加。



一重要层面上却可以看出发展与和平的内在必然联系。倘若把问题聚焦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那么实际上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关键因素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民主。因为,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而言,国家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时,才能呈现出自己的价值与力量;国家的最高使命似乎就是战争。

所以,我对乔拉森·波拉克博士说:“所谓民主或专制不应当被视为国家之间战争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在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之间,仿佛还存有着更为深层、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其他方面和其他因素。不要因为一个误解导致另一个误解,我行我素地设置假想的敌人。”

(二)

因此,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可以成立的,只是因为世界文明进程的曲折多变使和平的实现表现得更为复杂困难。冷战时期政治力量相互对立的明确性、不可变易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家各民族及其各文明体系之间依赖、信任的模棱两可。世界已由两极化而多极化,战争冲突的因素因此也发生了变化。20 世纪之前的战争冲突大多以国家力量的较量,领土、人口及财富的争夺作为表现形式;20 世纪上半叶,由于政治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及其全球性影响,战争与革命成了时代的主潮,并逐渐以意识形态冲突两极化的形式促成了冷战时代的到来和冷战思维的成型;而到20 世纪末的十年,伴随着冷战的结束,面对着某些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倾向的逐步呈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已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符合全球发展的一致趋向。

这绝非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的价值诉求,也不能因为人类和平所面临的挑战而模糊了对于当今时代主题的认识。更为复杂、更促人深思的是不同的发展观与不同的和平观之间的冲突与磨合。

基于不同的国家政治立场或文化价值理念,即便是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并因为这些价值判断的相左,而会在某些立场、理念的驱使或诱导下,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逆转为彼此敌对的关系。在这样一个

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和平，发展并非不可能（冷战终究已经结束），但战争，冲突也绝非不可思议。

乔拉森·波拉克博士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经济发展，力量强大的，都是美国的盟友；仅仅只有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美

国人对此很有些焦虑。”这也就是说，发展本身并不等于和平。

如果持有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那么实际上任何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发展，都有可能与此中心立场相悖异。这正如某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为消除贫困而寻求发展，为人类生存而防止全球生态灾难的举措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包涵着反西方因素或反西化的价值

倾向。虽然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科技文明普及全球，非西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均在技术、商业、大众文化和物质生活标准方面受其惠顾，但伴随而来的同时也有民族主义、民族文化话语表达方式的不断强化，而且，这种被强化的趋势在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愈益明显。这会使固有世界秩序及其组织者的地位受到挑战，它们也在要求或希望进入世界体系，在一个变化、重组的世界格局之中找到

自己应有的位置。

倘若固有的世界体系或者在世界格局的重新构建之中，无法容纳新兴发



《大战的预兆》 达利

从世界上新兴强国的历史来看，在某一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发生过不同规模的战争冲突。古典时代的雅典和罗马，11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17世纪的法国，18世纪的英国，19、20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日本与苏联，都因此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强烈的影响。



展国家，或者是不考虑将其纳入世界体系，依然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套上已不合尺寸的小鞋，那么，天下肯定不会太平。假如说“民主和平论”还具有某种理论参照意义的话，也即国际政治问题、国家利益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等也能以公正、民主的立场来处理、协调的话，我们有理由希望，这或许能够推进、强化和深化当代世界的和平进程。就这方面而言，人类需要联合国、国际政治也要求民主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也可以说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趋向，只有这样，人类的和平才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面和价值判断标准上得以真正地实现。否则，你不民主，我强迫你民主，你有冲突，我赐给你“和平”，这只会导致民主灾变。当今“民主和平论”的一大局限正在于此。

（三）

在人类的历史上，战争与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当代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和平与发展又成了一对孪生姊妹。和平的发展，发展的和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人类价值诉求在世界格局重新组合时的体现。对这一价值诉求的人为割裂，或者是它的表达方式中途受阻，都将会影响人类的自我生存方式。

对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来说，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所以，人类文明进化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21世纪的发展必然应是公正合理的内涵发展，真正的人类和平，也只有在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人与社会关系充分协调，只有在全球化与民族矛盾得到有利化解的基础上才可能圆满地实现。

这一思考将有利于廓清两大思维误区。其一，它会说明，背后由更为隐秘的政治利益支撑的、徒有理论形式的和平概念，只能流失为政治外交家们手中的游戏技巧；其二，它将经验地验证，在一个独家经营的单极世界中，难以降临一个为了民主而捍卫或拯救和平的救世主，并由此斥除在和平问题上的乌托邦理念。

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和平观，也必具有与之相应的新的发展观。

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中曾冷静地总结道：“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

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冷战时代结束之前，1945年以来的历史，并未能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因此囿于后冷战思维方式的战略家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敌人”。

诚然，在国家利益驱动之下所寻觅的敌人已与冷战时代的敌人概念有所变异，在更大的意义上，或许只是假想敌。因为在全球范畴之内，毕竟已不再存有不可变更的对立化的两极。

如果着眼于21世纪人类命运的前景，人口爆炸、自然资源的逐步枯竭，某些民族地区的持续性落后与贫穷，才是未来世界中社会动乱的最主要的根源，才是全人类须要共同对付的“敌人”。尽管消除这一“敌人”的方法和力量目前还掌握在各个国家手中，但是，因为这一“敌人”是全球性的，是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所以它要求各国协同作战，一致对“敌”。

曾经是执意去找寻的“敌人”，不过是一种源自人类利己性、征服欲的侵犯本能，并由政治话语所强化了敌我是非原则。这正如我曾在另一篇主旨相关的文章中所说的：“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我们所构想出来及面对的‘假想敌’就是我们自己！”

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远远大于控制人类自己的能力。如何控制那种源自人类利己性、征服欲的侵犯本能——即人类学意义的那一“敌人”，在和平文化的核心价值层面之上乃是一举足轻重、事关人类未来命运的最严重问题。这就决定了当代和平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战争冲突以及战争冲突因素的斥除，还应当涉及对人类文明史的反省检讨，思考新型的和平观念和发展观念，促使人类在人性本质层面上消除敌人概念形成的条件。

有人指出，今后的世界并不一定比冷战时代更为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往后的岁月将会使人类面临更实质性的挑战。因为，和平的敌人往往是人类自己的私利与贪欲。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心性和平观在创建 人类和平中的意义



· 耿 敬 ·

思
想
战
线

国际和平学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与战争相对的简单的和平概念。和平学者们正积极地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努力向个体生命、内在精神的层面进行拓展,探寻从根本上消除暴力的可能,并进一步以人类文明的和平演进为目的,将和平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或文化境界,凝结为人类的一种内在理想。和平学理论认为,国家的和平须以社会的和平为基础,而社会的和平则是以心灵的和平为前提的。因此,真正和平的实现首先需要人的心灵呈现出一种宁静与和谐,而追求心性上的和平乃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

1959年,挪威奥斯陆大学成立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专业学术期刊《和平研究》,标志着国际和平学的正式形成。迄今为止,国际和平学已成为欧美亚、非许多国家的重要学术领域。而作为学科专业性的和平学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

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想是感情上的宽容、忍让、和谐。它强调中庸，调和一切，以反身求诸己的态度，追求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一统与平衡。其准则就是通过内在精神上的超越来摒弃或征服暴力。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中，追求一统性的和谐与整合是通过离弃物质性和超脱物质性而获得的。所以，超越和离弃现实世界，这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是源远流长并内在于精神的。

中国的自然哲学传统中，那具有天之德的“阳”气的张扬性力量，与具有地之德的“阴”气的容纳性的力量，在矛盾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一种均衡协调的态势，而实践中的生命形式，也就隐没在这“天”之气与“地”之气的和谐和一统之中，在“隐没”中获得具有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愉悦。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就部分地在于把和谐与愉悦整合到意识当中去，又以一种耐心参与的态度让和谐不断生长。

中国传统的心性和平，其实颇具某种“平衡”和“实用”导向，这在儒、道、佛三教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展现。

道家所讲的心性和平，是着重于对道法自然、无为、无争的个人体验，崇尚一种近乎自然的淳朴宁静，强调的是个体最终的隐没和被超越，或是被整合到集体之中，或是被整合到整体的和谐之中。虽然个体的命运和宇宙自然的流动一样，都无严格的规则体系，但个体却永远与自然和命运的过程同在。佛教中的禅宗则着重于个体生命对人间俗世的超越意向，与对真实自我的彻底觉悟。其中，超越所达到的那不可言说的虚空“涅槃”，则是一种完全空无、自由与和谐的人类意识状态，而明心见性后的觉悟，是不受任何有限实物拘束的一种完美的愉悦，也是永远保留在其本性中的和谐。所以，佛教在更深刻的内在价值层面上提出了其心性和平的哲学命题。而儒家则是以和谐与平衡作为处理宇宙自然、社会政治及内在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它一方面强调普适性的社会伦理原则的重要性，主张具体的道德规范应牢固地建立在尊重与服从之上，并在与自然的和谐对立中，将人类社会的一切自然外在条件都考虑在内，构成等级制的人际关系和相互责任，努力使个体被完全整合入社会的结构中去；另一方面又强调道德修养、心灵塑造的



价值意义,以仁义道德作为教化人间的根本,以人心的向背程度作为天下一统或安定的尺度,以正心、诚意、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保障和基础,以谐和、平衡的理想精神作为化解,消除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不利因素,从而形成了“结构和平”与“心性和平”互补的和平理念。

尽管儒、道、佛三家的关系在历史上曾时常有所紧张,但在宽容和忍让的理性下,彼此间的合作和交流仍能得以实现,仍能和睦相处,并孕育出许多对内部世界进行精神整合与和谐化的素质。

在这里,持久的和平不在于政治上的一致,而在于整体人类智识和道德上的纯化。

在中国“三教合一”的信念中,竟承认这是三种不同的教派或文化传统,又不认为它们存有彻底的根本性分别。虽然其中的“分别”是无法弥平的。

和平不仅仅是消极地,简单地取消军事力量和相互威胁,而是要提高人的人性,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和融合,使之真正具有创造性。和平问题也就不仅仅是平衡社会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问题,它首先要为人类在精神深度上提供意义体系,了解诸文化及其思维模式间的相似和不同。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文化、多宗教交汇的场所,其融通不同文化或宗教的经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她的文化总是保持着时有调整的持续性和面对新型文化碰撞时的弹性,也就长久地保持着持续的和谐。这里,没有那种排他性的真理观的思维模式,并不把文化看作是某种具有等级秩序的固定实体,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平等地对待其他文化的差别与相似。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它的成功也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即它所融通的文化大都属于相同类型、具有相似禀赋的内省性文化,而对外向性文化,如对欧洲文化的融通尚缺乏成功的经验。

任何单独的一种文化传统或思维模式(如儒家或佛家文化传统)在人类价值观方面都只能代表个别,不可能从中取得全球性和平的“理念”,这种“理念”必须是在各不同文化的相互对话、交流中获得的某种“共识”。全球和平的问题,也很难仅仅靠某一种特殊的伦理体系、或某一个特殊的民族去加以解决。

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正涌动着强烈的要求，希望实现普适的伦理规范和义务，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和平与生态平衡，希望实现人类积极情感的复兴和增进，使人类进入更美好的和谐的社会。而这一努力所获得的真正的和平，应当是动态的，应是不同思维背景下的文化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前提下相互碰撞、交汇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状态。因此，这就需要中国传统的心性和平观与欧洲的和平精神进行有意义的直接对话。

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或碰撞，不但是和平的存在方式，也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或碰撞，在不同价值观的比较中，才有可能认清各自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尤其是传统的西方价值观——一种在当今世界上占有某种优势地位并影响未来和平进程的价值观——的缺失所在。欧洲“能动主义”的和平精神，是在康德时完整地树立起来的。

康德认为，真正的人类和平只是一个无尽头的历史动态过程的理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热切之情。和平作为一种完全成熟的状态，仍是一个尚未达到的目标。而作为一种原则，意味着这些共同体和个体的人一样，都被赋予了为公正而奋斗的使命。他的这种理念排斥所有对“和平”的形而上思考，强调人是能动的存在物，认为人以对“和平”向往的热切之情就可以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一个以“法律与秩序”为基础的和平社会。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所期待的和平只是为了保障自己能够平稳地享受世俗的生活和事物，那么这种和平秩序，也只能依靠强制力才能得到保证。而一个靠“法律与秩序”维持的政体，在有限的共同体中或可存续若干时期，但对整体人类来说，这种脆弱的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真正的和平应该是一种普适的和可接受的和平，它应该是由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在相互容纳与补充

1948年7月13日，八位社会科学家聚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了《社会科学家争取和平的呼吁书》。这既是社会科学家对引起战争紧张原因的声明，也是战后世界和平研究的滥觞。

的基础上结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这种和平只有依靠和通过不同质文化间平等的相互交流、对话和碰撞

后才能产生，这种和平不可能是单一色调的标准文化。“我们人类已经到达了可以对引起战争紧张的多种原因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和平是非战争状态的“平静”，在这种



和平中，人们是在某些特定的标准、规范或管制下“平静”地生活。对这种和平的认识或反思，是在没有和平的年代里体验到和平的可贵之后而获得的。所以，这种和平的获得既是自愿的，也是强制性的。因此，无论“能动主义”和平抑或心性和平，都不能算是人性得以自由展现的和平。时代所发出的创造新价值的呼吁，使得我们不可能再局限于“能动主义”和平精神或心性和平观这种传统和平的视野当中，来建构整体人类的新和平。

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和平，也可解释为是一种对立的稳定，亦是多元的稳定。它允许许多种组织结构方式并存、使人通过参与去理解或欣赏对方、获得自我认识，从而使人类天性得以自由展现。这种世界和平，意味着秩序，但它不是由“外部”以暴力强加的，它呼应于人类的基本禀性，促进人类更加人情化和人道化。因为，人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共振，可发展出崭新的、更高的人情和人道。这种呼应于人类禀性的世界和平，必须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禀赋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基础上的新秩序。

近年来，欧洲学术界十分强调“跨文化”研究，其指导思想正是要从世界各文化的平等对话中汲取营养，同时反思各传统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的不足。这一指导原则，对于当今的和平探索也是十分有益的。“跨文化”代表了一种态度和一种信念，即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自认为是全人类的文化。它

跨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多种文化背景中的有关资料的比较研究，来检验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研究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和作用。

把多元主义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一是防止某一文化走向自身绝对化，同时又并不排除此种文化对自己位置的义务和承诺。它超越于文化差异，也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

当然，绝对化的多元主义只是多种独特文化的简单共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淡薄了人性。因为，真正的和平应是互补的和平，不仅是各文化间相互“和平共处”，更多的还应是不同文化在碰撞或冲突后的中和。在互补的和平中，对立面的碰撞与冲突，可以促进一切文化积极潜能的整合，提升人性。

在一些“文化多元”的国家中，的确也存在着某些跨文化的现象，可一旦涉及到心

性和精神层面，其跨文化活动就显得十分薄弱，而这一薄弱又是产生诸多紧张和暴力现象的主要原因。面对这一切，中国传统的“心性和平”能做的也只是利用“和谐”法则绕开矛盾。当前，人类在经济、政治、宗教和道德等方面所出现的种种困难，也都根植于人类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缺陷。因此，应深刻地反思或批判文化精神禀赋中的消极的人性弱点，以及它们对和平进程可能构成的威胁（如欧洲自由观念中的侵略性）。

人们现今已普遍认识到各自所属的文化所存有的局限和缺点，因此想借助不同文化传统的整合来完善人类的价值。这就需要进行全球范围的文化碰撞，将某一特定文化传统的正、负“功能”都置于视野当中，通过对话与实质性“协作”，在相互吸纳或补充中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方面，并在合作中正视其消极方面和短处，以期达到更为整合的人性下的和平。

这种合作不在于诸文化形成适当比例的在操作层面上的合作，而应是在不同文化间进行真诚的无强迫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方式，更是一种社会方式。

和平问题，在实质上也就成为了诸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问题。然而，由于一切文化碰撞都含有紧张或暴力的成分，文化碰撞也将会常常伴随着不幸的产生，这是由文化本性上的排他性真理观所造成的。今天，和平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时常重温泰戈尔的那句话：“如果有一天，人性不幸被巨大的排他性普世洪水所淹没，那么上帝将不得不再造一个诺亚方舟，让他的造物能够躲过精神灭绝的灾难。”

超越了各自文化中的排他性，其碰撞和冲突更多的应是文化传统得到更新，并将文化的潜能激发出来。如果专注于理性的西方能动精神，与追求直觉与心灵和谐的东方禀赋发生卓有成效的精神交流，欧洲精神就可以能动地接受“心性和平”对精神和谐的某些敏锐感受，而心性和平那自足的宁静精神，也可在吸纳并整合欧洲文化的基础上，达到一种积极的自足与和平。那么，一种崭新的完全符合人性的人类和平或许便可从中孕育出来。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